

李友梅 等/著

YANGGUANG YIZHAN

阳光驿站

—— 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街道）
构建区域性党建平台的实证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阳光驿站

——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街道)构建
区域性党建平台的实证研究

李友梅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驿站——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街道)构建区域性党建平台的实证研究/李友梅等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7-81118-064-0

I. 阳... II. 李... III. 中国共产党-社区-党的建设-研究-浦东新区 IV. D26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8573 号

责任编辑 欧阳华 李顺祺 封面设计 柯国富

阳光驿站

——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街道)构建
区域性党建平台的实证研究

李友梅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字数 153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100

ISBN 978-7-81118-064-0/D·085 定价: 15.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张国洪

副主编：张 华

编 委：张 杰 顾晓鸣 宋占义

李 渤 费维照 李登华

李宝令 解 军 韩可胜

赵瑞春 王高安 卢马扣

著作者：李友梅 汪 丹 黄晓春

金 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重心在基层。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处在和谐社会建设的第一线,担负着团结和带领基层党员群众共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作用。”这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开展基层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浦东新区十几年的发展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极好的缩影。在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中,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急速转型、社会流动大大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也日趋多样化。所有这些都给党的建设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

2003年,陆家嘴社区(街道)党工委根据浦东新区区委提出的“三服务”(上级党组织为基层党组织服务、党组织为党员服务、党组织和党员都为群众服务)的要求,在全区率先建立阳光驿站,并使之成为关怀凝聚党员的新载体、联系服务群众的新网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平台。阳光驿站建立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同志视察了驿站,并作了批示,指出:“阳光驿站是,新形势下加强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有益探索,应继续实践、完善、提高,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推广”,肯定了阳光驿站所作的探索。浦东新区区委及时在全区各街镇普遍成立了阳光驿站,构建了覆盖全区的党员服务网络。

综观阳光驿站这三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驿站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服务群众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一,阳光驿站的组织形态多种多样、灵活多变,较好地适应了



外部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实现“三服务”的目标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作为一个工作平台,阳光驿站内部培育了不同类型的组织和工作载体,包括流动党员党总支、党员志愿者服务工作站、党员服务站(点)联络部等。这些组织和载体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拘泥于形式,实现了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较好地完成了各自的目标。

第二,阳光驿站积极探索“社会化”的运作模式,在社区公共资源整合方面发挥了枢纽性功能,为实现党组织凝聚社会的目标不断拓展资源基础。阳光驿站的功能定位之一是作为“社区党的各类组织资源交换、服务共享的平台”,其最初的设计理念中就蕴含了社会化的运作逻辑,即主要利用自身的力量,广泛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服务群众、凝聚社会,不断巩固党的群众基础。

第三,阳光驿站认真贯彻“服务”理念,不断开拓服务领域,通过服务来吸引和凝聚社区的党员群众,有效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服务是阳光驿站的核心定位,也是对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服务理念贯穿在“阳光课堂”、“阳光帮困”等11个工作品牌之中,体现在一点一滴的日常工作之中。通过热情、真诚的服务,流动党员党组织的凝聚力不断增强,阳光驿站也成为体现党组织和党员先进性、凝聚社会、凝聚群众的新窗口,成为促进和谐的有效工作载体。

第四,阳光驿站在凝聚的基础上还努力加强自身的“孵化”能力,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摸索出了一条新路。阳光驿站不仅是流动党员的接纳地,也是创建“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孵化器。对于在新的社会领域开展党建工作、实现“全覆盖”的目标来说,“孵化器”的功能发挥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阳光驿站的创新经验既需要积累和传承,也需要上升到理性的层面。《阳光驿站》一书从理论的视角再现了驿站从设计、创立到不断完善的全过程,揭示了基层党建实践创新的内在逻辑与机制,也为驿站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理论上的建议。这本著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可以说是理论专家、实际部门工作者和基层党务工作者合作开展党建研究的成功范例,既为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展示了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又为理论工作者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在课题研究的过程

中,许多专家学者深入到社区、楼宇和居民群众中,收集第一手资料,分享基层党建第一线工作者的切实感受。书中大量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使理论概括和提炼言之有物,真实有据。相信这本书的出版无论是对加强党建研究还是深化基层党建实践,都会有所裨益。

导 论	1
第一节 组织创新的深层动力	2
第二节 权变性中介纽带：还原驿站的组织特性	7
第三节 充满策略的行动原则与机制创新	10
第四节 谁是主体——回归创新组织的深层动力	12
第五节 阳光驿站：从有形组织到无形的文化建构	15
第六节 深入阳光驿站的研究方法	16
 第一章 深度变革：微观政治过程	20
第一节 磨合：文本与实践	20
一、理论设计与实际操作	21
二、创新理念向实践的创造性转化	27
第二节 调适：原有体制与新构造	32
一、体制性支持与“党建前沿”	32
二、目标—手段：隐含的张力	34
第三节 突破：经验思维与创新行为	37
一、经验思维的两面性	37
二、两种思维在矛盾中的结合	41
三、创新行为：对“路径依赖”的突破	42
四、阳光课堂：新思维的初步尝试	46
讨论：创新的微观制度环境	50
 第二章 组织的权变性建构	52
第一节 组织结构的权变性	52



一、留有行动余地的科层结构	53
二、科层体系内的协商结构	58
三、扁平式的结构	63
四、松散的等级结构	66
第二节 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匹配	71
一、新功能与物质载体有机链接	71
二、显功能与潜功能的相互嵌入	76
第三节 组织的孵化功能与再生产能力	82
一、产品之一：党员	82
二、产品之二：正式组织	84
三、产品之三：功能性组织载体	88
讨论：从“过度组织化”到组织的权变性结构	94
第三章 机制创新与行动策略	98
第一节 克服“路径依赖”：组织学习机制	98
一、一个组织学习机制的新框架	98
二、强有力的学习支持机制	101
三、面向环境的系统学习机制	105
四、理念的转化与深化机制	108
第二节 面向开放环境的资源动员与汲取机制	111
一、对体制内力量的充分汲取与优化重组	111
二、以核心志愿者为结点的横向动员机制	115
讨论：机制创新与体制勾连	117
第四章 象征符号、仪式与“阳光”精神	121
第一节 构造象征符号：政治意义与价值的再现	121
一、传统符号的运用	122
二、新的特殊符号	124
三、符号的意义	125
第二节 仪式：价值的回归	127
一、常规性仪式	127

二、新型仪式	130
讨论： 党组织仪式的凝聚功能	132
第五章 无形的驿站	134
第一节 组织隐形：行动者出场	135
一、积极行动与深化影响	135
二、理念传播与无形驿站	138
第二节 构造网络：组织的无形扩展	140
讨论： 无形的观念如何塑造有形的组织	144
第六章 阳光驿站的未来发展战略：创新的深化路径	146
第一节 走向“标准化”：阳光驿站优势累积与经验 传播	147
第二节 标准化建设与“阳光”内涵的深度演绎	149
第三节 “标准化”建设的主体框架	151
讨论： 标准化、核心价值与结构优化	158
后记	161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重要路径则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作用。”

在全党探索和谐社会建设路径之时，我们的研究注意力逐渐被吸引到了坐落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 CBD 金融商务圈的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这里的社区（街道）党组织于 2003 年率先创造性地建立一个新型的区域性党建工作平台——阳光驿站。阳光驿站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一种组织结构上的新调整、新创造，还意味着一系列新型工作机制、新型工作方式的确立，这其中展现出丰富的政治—社会意蕴和深刻的革新内涵。据我们观察，这种内涵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阳光驿站是面向发育中的基层社会的组织创新，它有利于党的工作更为有效地覆盖“流动社会”，因而是巩固党在新社会空间中的执政基础、群众基础的新举措。第二，阳光驿站在运行中锻造出了一系列新型工作机制，这些机制有效地发挥了“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因而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第三，阳光驿站在教育党员、服务群众方面摸索出了许多制度性的新路径，体现了基层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掌舵者”的积极形象。第四，阳光驿站作为一种灵活的组织平台，在社区公共资源整合方面发挥了枢纽性功能，使“资源汲取”、“优化利用”以及“资源再生产”三个环节创造性的勾连



于一体。第五，阳光驿站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新型载体，它运用精心设计的服务理念、行为识别系统和独特的视觉系统在日常工作中潜移默化地向人们有效地传播了“阳光服务理念”和党的核心宗旨。

今天，当人们回首阳光驿站创立以来的三年时光，我们将发现：与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它的产生与发展也经历了各种挑战，作为一个独到理念和创新思路相结合的产物，驿站成长的这三年就是一个有关组织与人员不断运用智慧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也是一个新型组织载体、新工作机制和已有体制框架逐步磨合的过程，更是一个“上下结合”的制度创新过程。我们深感这个“小小”的驿站中蕴含着契合新一轮社区党建思路的许多新特征，正是基于此，我们试图通过系统地还原驿站组建三年来的实践路径，从而更为深入地去体会这些新特征所包含的深刻意义与启示。

在导论部分，我们将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五个核心问题之上，它们分别是：“阳光驿站组织创新的深层动力是什么？”、“驿站的根本组织特征是什么？”、“它依赖怎样的一系列特有机制获得卓越绩效？”、“驿站的主体是谁？”、“符号与文化传播在驿站运作中的特殊作用是什么？”对这五个问题的深入剖析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阳光驿站这一时代创新之物背后的深层属性与运作逻辑。

第一节 组织创新的深层动力

浦东新区的第一个阳光驿站坐落于繁华的陆家嘴街道，从2004年始，驿站由于出色的工作效能开始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几乎每个月，都有来自全市其他地区和国内其他兄弟省市的访问、参观者来到这里学习考察。当他们驻足于外观别致并具有视觉冲击力与文化震撼力的驿站大厅时，也许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会产生类似的疑问：阳光驿站组织创新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其解决和应对的关键问题，到底是改革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还是“根本性的趋向”？

这个疑问，说到底涉及了驿站建设的基本思路与初衷，要对其作

出准确的回应,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上海以及浦东在快速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党建瓶颈问题。

1990年4月18日,当中国向全世界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时,一个伟大的航程由此起步。浦东开发开放带动了整个上海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同时给全球展示了一个中国现代化、国际化的前沿窗口。在经历了一个起步和摸索阶段后,浦东逐步进入到一个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新历程。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浦东以全市1/12的土地面积和1/10的人口,创造了全市1/4左右的GDP和工业总产值、1/2强的外贸进出口额,总体经济实力相当于十五年前的整个上海市。2003年浦东的GDP达1504亿元,比1990年开发之初的60亿元增长了25倍。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浦东新区的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速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浦东新区是上海市人口最多的区,也是我国开发进度最快、人口增长最迅猛的新兴开发区之一。浦东的开发开放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由于人口特有“产业跟随性”的特点,因而浦东新区的开发引发了中国乃至世界各地人口的迁移集聚。浦东新区人口由1990年占上海市总人口的10.14%上升到2000年的14.16%,10年增长100余万人。1995—2000年的5年间,浦东新区共迁入人口63.2万人,其中由市外迁入人口39.9万人,占了近三分之二,由上海市其他区县迁入23.3万人,占36.9%。

自浦东新区实施开发开放战略以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引起了人员结构的巨大变化。人才总量大幅增长,学历结构趋于高层化,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在人才总量方面,截至2000年底,浦东新区各类人才由1990年的6.62万发展到30万,占上海人才总量的17.9%,相当于开发之初的5倍,平均年增长17.5%。在学历结构方面,浦东新区的学历结构与1990年相比,获得了很大的提升,大专以上学历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4.2%上升到9.6%。在年龄结构方面,浦东新区35岁以下专业技术人员占46.8%,比1993年增加9个百分点。在吸引留学人才方面,截止2001年8月底,创业于浦东的留学人员占上海市的十分之一强,达3000人。其中高学历人员(硕士



和博士合计1400人)占总数的75%以上。

在上述几个方面发展的背景下,浦东一些区域的现代居住功能和居住格局也进入了高速优化阶段。观察者们在最近几年时间里发现:在浦东CBD及周边地区规划建设了一定数量的高档居住区。CBD格局与功能的拓展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内自由流动、优化组合,陆家嘴地区呈现国际化的居住格局,一座座现代化国际社区逐步成型并扎根于这片开发的热土。时至今日,在陆家嘴CBD地区,不仅集聚着金融、商贸、会展等机构和中心,而且也形成了具有国际水平的高档居住区,如仁恒滨江园、盛大金磐、艺术传家堡等。一大批中外籍高收入阶层入住在这些社区,CBD周边地区的居民结构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同时,一些细心的观察和分析家也发现,这些高档居住区的居民与原有的社区居民不仅在居住格局上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他们在工作方式、消费方式、生活理念上也与传统的社区居民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社区新格局和新形势对党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和领导社会的方式和途径提出了新的课题。

这些变化意味着一个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社会形态正处于快速现代化前沿的浦东地区逐步显现,这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社会成员之间基于分工之上的相互依赖程度空前提高;第二,社会流动日益频繁;第三,社会权威结构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第四,社会成员的自主性意识逐步提高,他们在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等方面与主流意识形态有一定的距离。随着这种社会形态的逐步显现,一个极具战略性的话题逐步呈现出来,这就是:如何对这种社会形态进行有效的“渗透”与管理,如何引导这种社会形态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可以说,这个战略性问题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得到了浦东新区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浦东新区组织部领导回忆说:

阳光驿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产物,而是代表着应对新情况的策略。如果说,过去所有的党组织都是体制内的,那么在转型以后,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最新情况就是体制外单

位不断的扩展,它里面有党员,有党员就要建组织,有组织就要开展活动,而这些活动在不同的体制外单位内会有不同表现。根据我们当时掌握的情况,体制外的单位可以大致分为民营企业 and 外商投资企业两类,第一类民营企业,其老板在中国生中国长,受中国共产党教育多年,即便不是党员,情感还在,这种情况相对好些,比如说企业里面建了个组织,要开展活动,他会给予支持,提供场所。第二类外商投资企业,入世以后,外商投资企业越来越多了,这些企业里面也有党员,有党员要建组织,有组织要搞活动,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大多数不可能提供这种条件,这样组织开展活动找不到地点,没有活动平台,这就是我们党在建设当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要分析判断发展走势,尤其是入世后体制外的份额越来越大。如果我们面对这种趋势视而不见,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那么就会对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构成威胁。阳光驿站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因此说,驿站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所依赖的运行原理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意义……

随着我们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阳光驿站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新时期党建工作平台与组织载体的问题,其之所以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流动党员的欢迎还有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这就是:它为相当一部分在快速流动社会里处于“心灵漂泊状态”的社会成员重新建立了心灵依赖和文化认同的空间。

更进一步看,在浦东快速现代化前沿逐步呈现出的这种新型社会形态的主要承载者是新一代的上海白领群体。同时也正是迅速增长的白领群体所具有的特质赋予了这种新型社会形态新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要对这种新型社会形态的管理方式进行深刻的思考,有必要清晰地了解和分析快速现代化过程中的上海白领群体的特质。

上海白领群体萌生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背景之下。当代上海白领群体是在一个并存着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多种社会逻辑的国际大都市中快速生长起来的社会群体。上海白领群体在近十多年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拥有的物质条件还刚刚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白领水平接近,而他们所崇尚的却是“后现代”



的消费文化和商业理念。上海白领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具有了后现代的价值观念,他们不仅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成就动机、法理权威、公民规范与责任感,而且还更热衷于实现个体幸福的最大化,进行自由选择。^①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商务区(中国最现代化CBD)可以发现一个以“白领群体”为主体的“流动社会”,它至少有三个基本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这个“流动社会”是嵌入在职业结构高速分化与变动的过程中的。我们观察到的上海浦东白领职业群体及其结构特征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转型时期凸显出来的,这个职业群体的社会心态和社会功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根据我们的观察,浦东白领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约占整个白领群体的90%以上)是面向市场的,^②他们是在一个“职业结构高速流动”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

第二个特征是:这个“流动社会”是嵌入在一个全球产业链动态变化的过程中的。在这个产业链动态变迁的过程中,生产要素、构成核心竞争力的知识结构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这意味着,浦东新区的白领从业人员已经或多或少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受到了另一种竞争规则的影响。他们将不仅与身边的同行竞争,还要面对着众多的国际同行,他们有着知识结构更新与职业经历刷新的迫切要求。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比较短的一个阶段里,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不一样,他们缺乏必要的缓冲(西方国家在进入全球生产体系之前曾经历过一个相对缓慢的过渡时期),他们由此感到了高度的不安与无助。

第三个特征是这个“流动社会”是嵌入在一个社会关系不断重组的过程中的。上海浦东的白领群体是在一个群体的快速组合过程中生成的。所谓“群体快速组合”指的是,在浦东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过程中,大量的高素质人员开始从国内其他地区以及海

^① 参见,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② “S白领群体”表示的是面向市场的白领群体,S仅为一个符号标志,没有特别含义。

外流向浦东,他们与上海本地的人才共同“组合”成了上海白领职业群体。由于这个群体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通过“流动”组合而成的,因此其社会关系也在比较短的时期内经历了一个快速重组的过程。这个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在进入上海社会的同时,把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亲朋关系网络留在了外地。正因为此,人们往往把浦东发展过程中进入创业的群体称为“白手打天下”的一群人。“白手打天下”确实意味着新时期某种高涨的创业激情,但是这个形象的描绘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这个群体离开了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由于日益激烈的竞争,他们又无精力在短时间内在职业生活的区域内构造一个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呈现出了内心的孤独与不安。

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呈现出浦东白领群体焦灼与不安、无助与彷徨、寂寞与孤独的特点,这三个特点共同构成了这个“流动社会”中个体的“漂泊”心灵状态,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这个大都市中匆忙的“过客”。这个群体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获得一种相对稳定而贴切的“驿站”。而阳光驿站恰恰在最关键的时刻为这些都市中漂泊的“过客”提供了重建社会支持网络、获得心理慰藉的新型平台,从这个意义上分析问题,人们便不难理解阳光驿站所代表的深刻组织意蕴——显然,这种组织创新是在一个迫切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趋势,因而更得到人们的关注。

第二节 权变性中介纽带: 还原驿站的组织特性

作为一个创新的组织载体,驿站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了很强的灵活性,它有效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面对流动党员开展工作的困境,同时也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系列大受欢迎的服务。在看到驿站如此运行绩效的同时,人们也许会萌生这样一个问题:驿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它依据什么原则而运行?

作为驿站诞生以及三年来运行过程的见证者,曾在浦东新区党校担任副校长的刘德荣同志对此曾有一段颇为深刻的评论: